

# 耶律大石西迁意义简评

斐丽丽

**摘要：**契丹贵族耶律大石的迁徙，是在辽朝处于内外交困境地，分崩离析边缘的转移策略。他率众西走，先于可敦城称王，后于叶密立称帝，继而在中亚建立起一个承载故辽传统而又吸收地方特色的西辽帝国。耶律大石在西辽的统治，本着兼收并蓄的思想，使契丹、汉文化在中亚的突入取得了成功，在中国历史、中亚史以及东西文化交流史上，都有其重要的地位。

**关键词：**耶律大石 西迁

## 一、耶律大石西迁的背景

一个民族的成功大举迁徙并不是一件易与之事，作为一种社会行为，强势的推动力、充分的容纳力与一定的适应力是其必要条件。不必说安土重迁的农业社会，即使是居无定所的游牧民族，也不会轻易放弃自己水草丰美的生活地。契丹族聚族而居，自南北朝以来到辽宋时期，已有七个世纪，北方辽阔的草原一直是他们驰骋的天地。立国时期，“辽境东接高丽，南于梁、唐、晋、汉、周、宋六代为敌，北邻阻卜、术不姑，大国以十数；西制西夏、党项、回鹘等，强国以百数。居四战之区，虎踞其间，莫敢与撻，制之有术故尔。”<sup>1</sup>但统治集团经过常年政权经营，政治腐败，体制滞后，效率低下，各种社会制度的弊端都显现出来，辽出现了严重的政权危机。这正是耶律大石西迁行为的历史大背景，也是促成其行为的客观因素。

天祚帝时期，辽朝已经处于内外交困的境地，分崩离析的边缘。腐败的吏治，繁重的赋役与剧烈的阶级分化，拮据的财政与两极对立的社会，被压迫者的起义与升温的民族矛盾，如此等等，都表明了辽政权的生存危机重重。而促成契丹族最终退出北方政治舞台的因素，是它统治之下的女真族的军事打击。据《契丹国志》记载：

“女真服属大辽二百余年，世袭节度使，兄弟相传，周而复始，至天祚朝，赏刑偕滥，禽色俱荒。女真东北与五国为邻，五国之东邻大海，出名鹰，自海东来者，谓之‘海东青’，小而俊健，能擒鹅鹜，爪白者尤以为异，辽人酷爱之，岁岁求之女真，女真至五国，战斗而后得，女真不胜其扰。及天祚嗣位，责贡尤苛。又天使至，百般需索于部落，稍不奉命，召其长加杖，甚者诛之，诸部怨叛，潜结阿骨打，至是举兵谋叛。”

1115年（辽天庆五年），女真族阿骨打称帝，国号“金”。他联宋抗辽，率领被压迫的部族进行民族独立的事业。而此时的辽朝处于天祚皇帝的统治下，他耽于畋猎，不恤国事，使朝政无序，奸佞掌权，面对金的军事进攻，辽军节节败退，天祚帝步步逃亡。在黄龙府、东京、中京等地相继失陷之后，他仓皇奔西京大同府，而后入夹山，留下他的宰相臣子为自己断后保卫江山社稷。由于统治者的混乱无序，指挥失当，政权分裂，1122年（保大二年），北辽朝廷在政令不通的情况下擅立，《大金国志》评“辽朝自此分矣”。

而促成耶律大石西迁计划形成的第二个因素是他本人的政治经历以及救亡图存的心理，这是其主观方面的因素。他的西迁，并不是一蹴而就的突发事件，而是随着形势的发展，逐步成熟的策略。耶律大石（1087—1143）其人，“字重德，太祖八代孙也，通辽，汉字，善骑射”，<sup>2</sup>曾中进士，擢翰林应奉、翰林承旨，辽人称“大石林牙”或“林牙大石”。后任

泰、祥州刺史，辽兴军节度使，可谓文武双全。作为契丹贵族，他在辽、北辽朝廷中均率领将士，抵御外族的进攻，曾取得一定的胜利，但却不能力挽狂澜，无助于大势所趋。在北辽小朝廷崩溃后，耶律大石不顾四军大王萧干的反对，率众投奔天祚帝时，却遭到了皇帝的备加责难。辽朝岌岌可危的形势本来只有靠协力的合作和整齐指挥才有得一拼，但天祚帝如此行为，不仅仅是被压迫人民反抗的对象指向，他在统治阶级上层的威信也丧失殆尽。这无疑又为耶律大石西迁思想的萌芽推波助澜。耶律大石在天祚帝的身上已看不到辽复地振兴的兆头，被俘金营时辽金力量的对比的认识又使他更清楚的明白了现实的严峻，主观和客观的力量一步一步的推动着他的西迁计划的成型。

当耶律大石逃回契丹，把西迁计划劝谏给天祚帝时，不仅得不到皇帝的认同，反而激起了幼稚的皇帝置于死地而后生的勇气，妄想与金一决死战。他于此彻底的绝望，于第二天清晨率领部分将士“宵遁”，向西北地区发展，一路扬长而去，直至可敦城（即镇州）。据《辽史·天祚本纪》记载，其时为 1124 年（保大四年）。

此外，耶律大石之所以向西迁徙，其一，考虑到辽朝经营西北地区，未遭军事打击，势力犹存。魏特夫、冯家生在合著的《中国社会史——辽》一书中云：“在辽帝国这座破碎的大厦里，仅余的尚未消耗殆尽的军力，是安置在西北边防上的一大批有经验的士兵和大群马匹”。<sup>3</sup>这一地区尚有一定的容纳力，可供耶律大石带领部众休养生息，招兵买马，作一调整。他带领兵士到西北地区，既给那些长期戍边的兵士带来了希望，又为自己的政治雄心赢得了群众基础。耶律大石会集十八部七州军士，以慷慨激昂的演讲鼓舞士气，“遂得精兵万余，置官吏，立排甲，具器械”<sup>4</sup>，积聚了军事力量。《松漠纪闻》记载：“松漠以北旧马，皆为大石林牙所有。”其二，辽与西域诸国的关系一直较好，遣使往来不断。辽圣宗时，波斯和大食均遣使节来访，圣宗“以王子班郎胡思女可老封公主”，嫁与大食王子。而西夏同辽的关系更为密切，一度为辽藩属，与其为甥舅之邦，两国一直保持着朝贡和通婚关系。辽在危难之际，“夏将李良辅，将兵三万来救辽。”<sup>5</sup>除此之外，辽与西域诸国商旅往来频繁，《契丹国志》卷八十二记载：

“高昌国、龟兹国、于阗国、大食国、小食国、甘州、沙州、凉州，以上诸国三年一次遣使，约四百余人，至契丹贡献玉、珠、犀、乳香、琥珀……契丹回赐至少亦不下四十万贯”。

他在西北与金、宋形成了均势，金既不能把大石斩草除根，大石也没有挥戈东进的实力。在休养生息之后，他大约于 1130 年（金天会八年，辽亡后五年）假道回鹘，向西发展，先于叶密立称帝，最终在原喀拉汗王国驻地八拉沙衮建立政权，史称“西辽”、“黑契丹”或“哈喇契丹”。<sup>6</sup>西辽建国之后，经过一系列东征西讨，臣服河中地区和花刺子模，在中亚建立了疆域广大的军事统治，其附属国有东喀拉汗王朝、西喀拉汗王朝、高昌回鹘汗国、花刺子模等国，葛逻禄、康里等部。

## 二、耶律大石西迁的意义

耶律大石西迁计划逐步成型并付诸实施，是内外交困的辽朝各方面因素一步步推动使然，而西迁过程中的发展壮大，是大石正确考虑到西北地区的容纳力和辽与西域各族的关系，采取了正确的措施使然。为什么中亚地区可以接受西辽这样一个异族的统治呢？他的迁徙对于即将灭亡的辽朝又有什么反作用呢？这是笔者研究这个题目的主旨所在。耶律大石的西迁，无论对于耶律大石及其随行人员，还是对于他们身后所代表的那个已经即将退出历史舞台的辽政权，抑或对于迁入地区（即西辽所在地）和中亚临近地区，都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对于东西文化的交流，也起了很大的积极作用。

首先，耶律大石的西迁，对于金和宋政权来说，有一定的影响。耶律大石的西北屯兵，成为掣肘于金的力量，客观上遏制了金南下灭宋的步伐。而宋对耶律大石，既有顾忌，又

心存联合之念。虽然大石起初并没有南下的打算和实力，但在西夏、金、宋政权各政权之间，短期内起到了平衡作用。在他开始向外发展，试图联合宋朝的时候，又刺激了金的进攻策略，从而打破了平衡局势。

辽与西夏关系源远流长，当时壤地相接，一定有过交往和联系。金由于对耶律大石和西夏势力联合的顾虑，对他的动向颇为留意，一直派人密切关注。《金史·太宗本纪》云：“辽详稳挾不野大奔，言耶律大石自称王，置南北官属，有战马万匹”，太宗命令“攻讨大石，须俟下报”。1125年，西南西北两部权都统完颜希尹向朝廷报告：“闻夏人约大石取山西诸郡”，太宗令“大石合谋，不可不察，其严备之”。<sup>7</sup>1127年，金太宗下诏伐宋康王，河北诸将欲罢山西兵，并力南伐，宗翰提出反对意见：“初于夏约夹攻宋人，而夏人弗应。而耶律大石在西北，交通西夏，吾舍陕西而会师河北，彼必谓我有急难。河北不足虞，宜先事陕西”。<sup>8</sup>可见耶律大石的存在使得金有后顾之忧，不得不严密防备。

宋对耶律大石的发展也颇为重视。1126年，李纲在奏折中论罢起兵等事，提到：“探报有林牙之师，金人牵制，未必深入。”但同时又说：“然不可恃彼不来，当恃我之有备，则屯兵聚众，正今日之先势，不可忽也。”<sup>9</sup>1128年，宋朝使臣赵子砥使金，“盛闻（大石）结集兵马及数十万，待时兴举”。<sup>10</sup>1129年，南宋川陕宣抚处置使张浚报告说，大石派人持国书来宋，途中为西夏截留，但原送信的汉人已走过泾源，到达曲端处。<sup>11</sup>这说明耶律大石经过几年休养生息之后，已经试图联宋灭金，恢复故辽大业。此时的金只得一反审慎的态度，迅速征讨南宋，以免两者联合势力壮大。耶律大石此时处于劣势，没有复地灭金的能力，于是继续西行，寻求更好的立足之地。

其次，对于故辽政权来说，耶律大石的西迁计划对其影响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耶律大石的率众西迁，是辽朝军事力量的严重分裂，也是契丹族向心力的进一步背离。

耶律大石西迁时，随行人员并不多，《辽史》中记载他带走二百人的军队，而朱外尼《世界征服者史》中有两种说法，一为“有一只极庞大的部属相从”，一为“八十多个族人和他的随行者”。窃思当时宋金和议夹击辽朝，天祚帝昏庸无能，屡败屡逃，军队兵力已受极大损失。耶律大石西迁时，选择的是“宵遁”，可见其行动并不为太多兵将所从，他曾杀萧乙薛及坡里括，带走的极可能是他军旅生涯中的亲兵以及一些亲属，随行人员不可能极庞大，《辽史》所载尚可接受。姑且不论他带走的将士人数的多少，作为契丹统治上层中的一员，他的政治、军事威望都比较高，他的出走，本身就是一种离心散力，这种行为在当时的影响并不能用西迁人数的众多与否来衡量。耶律大石西走之后半年，辽朝将领叛降，天祚帝被金兵所擒，辽朝在北方白沟河以北二百一十年的统治结束。

第二，耶律大石的统治政策反映了和辽一脉相承的思想。对于变化了的地理条件和人文环境，耶律大石的政权经营有一种整体思想，即兼收并蓄，有容而大的儒家治国原则。

辽承汉唐之制，西辽又承辽制。契丹在西辽并不是主体民族，因此只有发扬兼收并蓄的治国原则，使社会矛盾调和平衡，才能巩固其统治。在统治政策上，耶律大石建都巴拉衮后，国号仍称辽，对辽的政治、军事、经济等制度并未作大的改革，也没有改信伊斯兰教。他在针对中亚民情做出政策上的一些调适之外，表现出受汉文化的强烈影响。这无论在政治原则、经济制度、军事制度、宗教信仰还是在生活习俗方面都有所反映。

辽朝统治者受汉文化影响颇深，历代皇帝均重视文治，重用汉人，学习中原礼仪。阿保机建国以来，一直以孔子学说和儒家经典作为主导思想，即所谓“辽家遵汉制，孔教祖宣尼”。随着统治阶级的推广，汉化程度逐渐加强，不仅在契丹上层，平民中间也多学习汉字、典章制度、儒学原则和风俗习惯等。耶律大石本人也是受汉文化熏陶较深的契丹贵族，

他西迁时带走的军队中有一部分汉人。在大会十八部七州军队时，亦带走了一些部族军，这些部族军成分复杂，很可能有辽统治圈中的各民族成分。所以西辽帝国中有一部分汉人，而且他们在西辽政府中的地位比较重要。西辽执政李世昌即是汉人，爵封郡王。西辽军队以骑兵为主，但也有步兵，这些步兵由汉人和奚人组成，西辽制造兵器的工匠也由汉人组成。李志常《长春真人西游记》中云：“汉人工匠杂处城中”。西辽王朝的官修史书用汉文写成，主笔者也应该是汉人或汉化程度很高的契丹人。耶律大石统治西辽的政策也采取了儒家治国的原则，减轻赋税，推广汉字，推行汉文化教育，争取当地人民的支持。

耶律大石在官制方面，承袭了辽朝“因俗而治”的原则。阿保机时期已经形成了“以汉制治汉人”的基本国策，后世辽朝社会发展均采取这种政治道路。耶律大石西迁时，曾“置北、南面官属”，组成政府机构，可见他在可敦城称王时期，依然采用辽朝的两部制。到达中亚，建立西辽后，针对此地民族成分复杂，广有回鹘族、哈萨克族等突厥语部落的情况，西辽国家体制以辽朝的两部制为基础，建立了南北面官属，对于游牧民族和农业民族采取分别治理，同时又采取了一些适应当地风情的变化。

耶律大石进入中亚之前，其地采用伊克塔制度，即分封制。这是导致后来中亚地区长期混战的政治因素之一。大石借鉴中亚以及中原王朝的教训，不分封领地，加强集权，社会相对安定，史籍中很少见到关于耶律大石时期中亚人民暴动的记载。辽朝习俗，以枢密使主兵事，而通常以皇子、皇弟为天下兵马大元帅，总领诸军。契丹皇族掌握着军事的直接指挥权，他人不得染指。耶律大石继续了这种制度，对军队建设极为重视，把军事指挥人员分为中级和高级，不给将领以实际的决策权，出征时临时调派兵士，使“将无专兵”，军队处于国家的直接控制之下。同时，武器制造也都置于国家官员的直接监督之下，使西辽王朝的统治得到进一步巩固。

耶律大石在西辽的统治，既继承了辽的精粹，又吸取了辽亡的教训，是对故辽的承袭和创新。

第三，他的西辽王朝保留了很多契丹族的风俗文化传统。辽朝灭亡后，除了耶律大石带走的部分契丹人之外，契丹族人都被置于金的统治之下，多迁入河北、山西境内，少数游牧于草原地区，遭受了强制迁徙、离散分解的待遇，与女真族、汉族渐渐融合同化。而西辽的国家政权在中亚屹立了八十七年，契丹族虽然不是主体民族，却依然保持了它的很多风俗传统，如西辽延庆三年，耶律大石派耶律铁哥率七万骑东征，出征前，

“以青牛白马祭天，树旗以誓曰：‘我大辽自太祖、太宗艰难而成帝业，其后嗣君耽乐无厌，不恤国政，盗贼蜂起，天下土崩。朕率尔众，远至朔漠，期复大业，以光中兴。此非朕与尔世居之地。’”<sup>12</sup>

这种军事出征前的祭天仪式，反映了一种深层次的民族本原意识。

再次，对于西辽迁入地，即其直属地来说，汉族、契丹族文化是一种异域的文化，它具有与当地文化完全不同的特质，两者的交锋必定会产生冲突与不适应。针对这种情况，耶律大石做出了正确的调适，使这两种文化在一地并存磨合，实现了兼容。耶律大石西迁的影响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政治制度方面。“就领土来说，西辽不如同时代的金和南宋那么大，但这个帝国的社会经济关系却如同其种族构成一样的复杂。它是由很多个分别处在从氏族公社一直到发达的封建制的不同发展阶段的部落和民族组合而成的。因此，这就使得这个哈喇契丹国家具有十分复杂的性质。”<sup>13</sup>西辽统治者在总结辽朝统治经验，吸取辽朝灭亡教训的基础上，面对复杂的政治问题，既承袭辽的“因俗而治”的原则，又开创了西辽独有的统治政策，并在不太短的时期内取得了成功。

西辽驻地虎斯斡耳朵（又称骨斯讹骨朵），斡耳朵意思是汗或可敦居住的帐幕或设在其中的宫廷。耶律大石称帝的时候，按照汉辽传统，上尊号为天祐皇帝，遵从汉制，而在进入中亚之后，称“菊儿汗”或“古儿汗”。拉施特在《史集》第一卷第一分册第二编中提到：“耶律大石是一个有智慧而又有才干的人，他有条不紊的从这些地区上将队伍召集在身边，占领了整个突厥斯坦地区，（从而）获得了古儿汗，即伟大的君主的称号。”有一种观点认为这是向游牧文化的倒退。实际上，中亚地区是亦农亦牧的地区，各种民族混杂，在西辽进入之前，为喀拉汗王朝统治，其传统历来是称汗、可汗，耶律大石先称帝，而后称汗，是他为适应中亚传统所做的调适，也是为得到其地人民支持的策略。在这方面，他表现了作为一个政治家应有的博大胸襟，体现了其文化传统中的兼容并包的气魄。

西辽的官制，以辽朝的两部制为基础，同时又采取了一些适应当地风情的变化。如在王朝官员的官职名称中，采用当地名称，更容易为当地人民接受。通过西辽王朝的官名设置，我们对其政治机构可有一些了解。见诸史籍的官名有：“同知枢密院事”、“枢密副使”等南面官名，耶律楚材在《赠李郡王笔》注释中有“李郡王常为西辽执政”<sup>14</sup>语。而北面官名则更多，如“护卫”、“兵马都元帅”、“六院司大王”等。这些官名均见于辽朝。《元史·曷思麦里传》中云：“为谷则斡耳朵所属可散八思哈长官”，这里的“八思哈”，即为突厥语官名。西辽对于其附属国没有太多政治经济干预，有的采取属国完全自治的原则，有的派驻官员常驻其地，有的则定期派官员收取贡赋。

第二，经济制度方面。原喀拉汗王朝实行双汗制，分封疆土，收取重赋。伊斯兰教规定，土地税需交纳其收获量的三分之一。而加之其他苛捐杂税，人民不堪其苦。耶律大石没有实行圈地，变耕地为牧场，也没有没收原统治者的财产，而是分给每户可耕种的土地，条件是须向政府交纳一个狄纳尔。狄纳尔是一种冲制的金币，每枚重约七八克，形状象榆荚，和中原地区的铜钱类似。刘郁《西使记》云：“民赋岁止输金钱十文，然贫富有差。”西辽王朝的税收制度是较轻的，人民得以休养生息，因而并未对这个异族的统治表现出强烈的不满情绪，原来的统治阶级的利益也未受到损害，大石的统治基础得到稳固，社会秩序安定，中亚的半耕半牧的生产方式得到发展，经济进步，人民受益非浅。在西辽为蒙古所灭后，西域人民对大石“至今思之”。

第三，宗教政策方面。耶律大石采取宗教自由政策，使各种宗教在西辽帝国并行，其教义和礼仪各异，所反映的文化也各异。基督教中的聂思脱里教派的简单仪式及教规使中亚游牧民族易于接受。萨满教在下层人民中流行。回鹘人自八世纪中期起信仰摩尼教，后来为喀拉汗王朝压制，此时又开始露头并一直持续发展。羽田亨认为，“大概十三世纪光景以后，此教就不行了”。<sup>15</sup>佛教也是当时有影响的宗教之一。辽朝统治者上层已信奉佛教，大兴土木，建造寺塔，在进入中亚后，又将其带到彼地，他在高昌回鹘的风盛就更不必说。犹太教也开始兴起，在花刺子模首都有八千犹太人。

最后，对于中亚地区来说，耶律大石的统治，结束了喀拉汗王朝分封混战的局面，实行羁縻政策，没有太多的干预，使得社会秩序安定下来，中亚地区在十二、十三世纪进入了其繁荣发展时期。其影响具体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促进了中亚地区的经济进步和城市发展。西辽直辖领地以及附属国的农业、手工业、畜牧业、商业都有很大发展。朱外尼在《世界征服者史》中提到：“他的百姓兴旺，他的牲口长了膘。”这说明西辽对畜牧业的重视。后来，有一部分从事畜牧业的契丹人改为从事农业，有伊志平诗为证：“辽因金破失家乡，西走番戎万里疆，十载经营无定止，却来此地务农桑。”<sup>16</sup>西辽农业种植品种繁多，生产技术提高。农业的发展又促进了手工业的进步，玻璃制造业、制陶业以及其他手工业都有所发展。

西辽疆域辽阔，属国众多，他东起土拉河上游，西至咸海，北越巴尔喀什湖，南抵阿

姆河流域，正位于亚欧大陆的交通枢纽，东接宋金，西通印度、伊朗、阿富汗，地理位置极其重要。据《松漠记闻》载，回鹘人“多为商贸于燕，尤能别珍宝。蕃欲为市者，非其人为佞，则不能售价”，这说明了回鹘人在金朝商业贸易乃至国际贸易中的重要地位。同时宋金的漆器也远销中亚。有《西游录》中为证：“城中多漆器（巴尔赫以西的转城），皆长安题识”。东西交通的通畅，商业的繁荣，与西辽政府秩序安定，关卡壁垒减少是分不开的。这一时期城市生活普遍高涨，“据统计，仅伊犁河谷地区，在十二世纪已达到五十六个（城镇）。”<sup>17</sup>

二、西辽的政治、经济政策和文化环境也为民族融合提供了成熟的历史条件。西辽帝国的创建者来自东方，主要是契丹人，也有汉人。在耶律大石进入中亚之前，据伊本·阿西尔记载，在喀拉汗王朝的边界上已住着一万六千帐从辽朝迁来的突厥——契丹人，东喀拉汗王朝阿尔斯兰汗派他们守卫边界，赐给份地，给予奖赏，但后来王朝与他们产生矛盾，强迫他们与妻子隔离，这些契丹人起来造反，多次受挫。当耶律大石的军队出现在喀拉汗王朝边境上时，他们便投入了他的军队，使西辽军队人数增加一倍。这些契丹人主要从事畜牧业和当兵。后来他们在回鹘人的影响下，从事农业，同回鹘人一起生产生活，也逐渐回鹘化。西辽亡后九年，出使该地的吾古孙仲端说“今其国人无几，衣服悉回纥化”。可见这部分契丹人后来又融入到回鹘或其他突厥民族中。

葛逻禄，是喀拉汗王朝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经常与王朝发生冲突，耶律大石时期使得他们与喀拉汗王朝分离，成为单独的政治实体，首府设于海押立。但他仍然是河中的不安定因素。1164年，西辽把葛逻禄人迁到喀什噶尔地区，不准携带武器。葛逻禄人起兵反抗这一政策，遭到西辽的镇压，此后他们在河中的势力衰落，改行从事农业或其他行业，逐渐融合到当地民族中，经过多年与乌古斯人、突厥化的伊朗人一起形成了乌孜别克族。

回鹘是西辽帝国的主体民族，高昌回鹘、东喀拉汗王朝、西喀拉汗王朝都是西迁的回鹘人所建，他们生产水平较高，逐渐融合了其他民族。

三、耶律大石实行宗教宽容政策，使西辽直辖地和属国内一时宗教盛行。不仅伊斯兰教依然流行，基督教得到发展，佛教得以传播，摩尼教等早已销声匿迹的宗教也又出现了。朱兹贾尼在《宗教保卫者一览表》说耶律大石秘密的成为穆斯林，伊本·阿西尔在《全史》中说他是一位摩尼教徒。姑且不论这些说法是否确切，无风不起浪，这些宗教一定在西辽帝国内有所影响，西辽政府的开明政策导致中亚地区的宗教勃兴局面由此可见一斑。各种宗教信仰竞相发展，思想文化也得到了很好的交流。

四、西辽的统治促进了中亚地区东西文化交流的加强，并使其成为这一时期中亚文化的最大特点。汉唐时期，中原文化圈就已波及到西域，中亚地区。到唐朝之后，藩镇割据，战乱纷起，中原与西域联系一度隔绝，但在耶律大石西迁后，汉化程度很高的辽朝遗老又把其文化传统带到中亚。西辽政府的官方语言为汉字。同时契丹语也在人民中间使用。当地的突厥语各民族语言也为契丹人民所学习。《北使记》载西辽附属国的文字“其书契，约束并回纥字。”这一时期在中亚发现了挂在胸前用来擦拭鼻子的丝织品。而在古代希腊和伊斯兰世界中并没有手绢。西欧手绢的出现是在十五世纪。在中国，手绢自古以来就使用，可见手绢出现在中亚是中国文化的影响所致。辽文化、汉文化与希腊、伊斯兰文化交相辉映。马迦特认为，“从来注意太少的文明帝国哈喇契丹在十二世纪和十三世纪暗淡无光的历史背景中是光芒四射的。”<sup>18</sup>

### 三、结语

耶律大石的西迁和建国，既是辽王朝的继续，也是汉文化和契丹文化在中亚地区的突进。为什么当时中亚地区可以容纳这样一支异文化的契丹人的统治呢？笔者以为，在众多的分封割据的势力之间，契丹族的介入是一种聚合的因素，它除了军事上的强力之外，在政策

方面的单一汗制、集权思想，经济方面的轻徭薄赋，宗教方面的容纳力上，都有一种整合的力量。西辽境内各民族的经济生活方式和文化获得了继续发展的温良的土壤，以迅猛的速度膨胀繁荣起来。诸民族的习俗、生活方式和文化传统实现了一种共处型的整合。

西辽的研究者多以历史的构建和政治意义方面来进行挖掘，这给西辽史的研究以论证充分的资料，也给了今天改换视角的分析的必要条件，尤其是在不同类型文化的冲突、调适与整合的分析总结之上。耶律大石的西迁建国之所以成功，是在文化聚合基础上的向心力的作用效果。喀拉汗王朝的历史条件也制造了一种容纳力，而耶律大石正好充当了进行适应聚合的人物。他从中亚地区的民族那里吸收了一些文化元素，同时又根据自身文化的制度和性质，拒斥了另一些文化元素，在新的环境体系之下经过加工改良，实现了文化的整合。正因为这种模式的成功，使得中亚社会秩序安定，经济文化得到发展，使汉文化又一次渗透到中亚，对于中亚人民意义深远。笔者试述耶律大石的西迁，只为抛砖引玉，浅陋之处，请不吝指正。

## A Discussion on the Westward-moving of Yelyu Dashi

Fei Lili

**Abstract:** During the TianZuo period(1101 — 1125), Liao dynasty had already been in danger of disintegration. Being the nobility of Kitan, Yelyu DaShi toss about to battle inside and outside the Great Wall, in order to save his people; But he couldn't get the aim.he resolutely led his people to move westward, avoiding the main dint of the enemy, and waited for the right time to take action.At first, he declared himself king in the city of Kotan, then emperor in the city of Ye Mi Li, subsequently set up Xi-Liao empire at Central Asia which not only inherited the tradition of Liao dynasty but also absorbed local special features. His action ended the confused conflict in Central Asia. the economic developed, the race blended, and the culture progressed.His action also took the Chinese culture to Central Asia, and had an important position in the history of culture intercourse between the East and the West.

**Key words:** Yelyu DaShi ; Westward-moving

---

<sup>1</sup> 见《辽史·百官志》。

<sup>2</sup> 见《辽史·天祚本纪》。

<sup>3</sup> 转引自纪宗安《西辽史论·耶律大石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8页。

<sup>4</sup> 同注释一。

<sup>5</sup> 引自《金史·夏国传》。

<sup>6</sup> 关于耶律大石西行路线和活动的情况，由于本文重点所在而略，可参见纪宗安先生《耶律大石西行纪略》，载《新疆大学学报》1987年第2期。

<sup>7</sup> 见《金史·完颜希尹传》，并参见《金史·粘割韩奴传》。

<sup>8</sup> 引自《金史·宗翰传》。

<sup>9</sup> 见《三朝北盟会编》靖康中帙24，海天书店，甲册487页。转引自纪宗安《耶律大石西行纪略》，载《新疆大学学报》1987年第2期。

<sup>10</sup> 见《三朝北盟会编》卷九十八，转引自魏良弢《西辽史研究》，宁夏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66页。

<sup>11</sup> 此处材料的来源及分析可参见魏良弢先生《西辽史研究》，第66页注释三。

<sup>12</sup> 见《辽史·天祚本纪》。

<sup>13</sup> 见《西辽经济问题》，载《中世纪的远东和中亚》，新西伯利亚，1980年版，转引自李锡厚《论西辽的政治制度》，载《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学报》，1989年第4期。

<sup>14</sup> 见耶律楚材《湛然居士文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2页。

---

<sup>15</sup>引自羽田亨《西域文明史概论》，钱稻孙汉译本，上海商务印书馆印，民国二十三年，第 78 页。

<sup>16</sup>见《葆光集》之“过大石林牙契丹”，转引自邓锐龄《西辽疆域浅释》，载《民族研究》，1980 年第 2 期。

<sup>17</sup>见《哈萨克共和国史》第二卷，转引自魏良弢《西辽史研究》，第 136 页。

<sup>18</sup>见巴托尔德《中亚突厥史十二讲》，罗致平汉译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 年版，第 129 页。